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书库
CHUANTONG ZHIXUE YU GUIZHOU WENHUA

王路平 / 著

传统哲学与贵州文化

——黔学中的形上智慧资源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014033038

B2
197

CHUANTONG ZHEXUE
YU GUIZHOU WENHUA
QIANXUE ZHONG DE
XINGSHANG ZHIHUI ZIYUAN

◎ 王路平 著



传统 哲学与贵州文化

——
黔学中的形上智慧资源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北航

C1721226

52
19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哲学与贵州文化：黔学中的形上智慧资源/王路平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 - 7 - 5660 - 0586 - 1

I. ①传… II. ①王… III. ①哲学史—研究—贵州省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4905 号

传统哲学与贵州文化——黔学中的形上智慧资源

作 者 王路平

责任编辑 舒 松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4. 5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586 - 1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邬锡鑫

厚厚的一摞书稿摆在我的面前，这是路平先生即将付梓的为纪念贵州建省600年而撰写的研究贵州文化的专著。

近些年来，研究贵州文化的著作陆陆续续面世，并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研究路子，而路平先生对传统哲学与贵州文化相互关系的考察所显现的理路，我以为最能揭示文化内核的形而上意义。

对于文化，我曾经说过，无论怎样去定义，都应将其内核揭示出来，这个内核就是精神价值意识和生命价值意识。毫无疑问，这两种意识在根柢上体现的肯定都是一种哲学的观照，可见，只有去揭示文化内核的形而上意义，才能逐渐接近文化的真髓，也才能逐渐感受到文化在其最深的层面上带给人们的愉悦。

我和路平先生都是学哲学的，共同的学术兴趣使得我们经常在一块谈天说地。十多年前，路平先生在下乡扶贫时患上了面神经麻痹，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错过了最佳治疗期，致使病情日益加重，回省城后在几家大医院治了许久都没什么效果。那时，他右侧面部直感到时时如敷着干硬了的浆糊而不停痉挛，再加上右眼无法闭拢，致使他整日痛苦不堪。后来，他接受祖国医学的综合治疗，在那个期间，几乎每隔一天晚上，我都和他相对而坐，或谈佛，或论道，或纵议中西哲学。他脸上、手上扎着银针，却在我们的精神交流之中，思维异常活跃地很快进入形而上的境域，看得出，只有在这一刻，他那晦黯的心境才顿然全无。我们沉浸于哲学思辨的快乐中时，又常常为时下社会信仰的缺失和世风日下的景况叹息！

是啊，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各种思潮的进一步碰撞，一方面，我国在社会大变革中出现了文化的多元格局，这无疑对人的主体意识的增强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生活中市场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各个领域正不断地渗透着市场机制，因而文化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严重冲击和破坏，使人的主体意识受到难以摆脱的压抑。最近三十余年间，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以往任何时段都多得多，但社会中被追逐利润最大化撬动起来的物质财富占

有欲，比以往任何时段大得多。与此相伴，享乐主义的蔓延范围日渐扩大，物质占有欲所推动的一些人对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的追求，已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这就对文化特别是文化的内核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和破坏。在物质财富大量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日趋拉大，腐败之风难以真正有效扼制，这又刺激着一些人物质占有欲的进一步膨胀，使得人文主义精神被逐渐消解，人的主体意识受到商品拜物教的严重压抑，一些人的信仰危机将他们的价值取向拖入困境。可见，为市场竞争机制所决定从而激发人们物质占有欲不断膨胀的价值目标，越来越无法对促使人们实现灵魂圣洁的文化价值导向进行回应，以致使得不少人精神家园迷失，从而导致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得以付出沉重的精神代价来实现。人的精神家园的迷失，表明市场运行机制推动的对商品利润的拼命追逐所造成的对文化的挤压、冲击和破坏，带来的恶果已很严重。不要以为文化建设就是修建一些文化馆、博物馆、歌舞厅、影剧院，等等，修建这些文化设施，多有一些文化载体，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通过制度的、体制的、法律的、政策的乃至学理的、教育的、艺术的、道德的等途径，扼制对文化的挤压、冲击和破坏，对文化的内核即精神价值意识和生命价值意识进行有力的张扬，以构建和守护人的精神家园，在当今更为重要。对人的精神家园的构建和守护，就是为了使人的精神挣脱商品利润的奴役，挣脱无度膨胀的物质占有欲的枷锁，就是使人最终实现精神的自由，从而得到真正的全面的发展。

我以为，路平先生在疾病的折磨中仍然坚持对哲学和文化进行学理的思考，在病愈后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哲学和文化的继续研究之中，体现的正是对构建和守护人的精神家园的一种自觉；同时，这种自觉又促使路平先生不断地拓宽着自己的学术视野。

在《传统哲学与贵州文化——黔学中的形上智慧资源》中，最先进入路平先生学术目光中的是王阳明。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后，提出了“心即理”，这“理”即是“天理”。虽然对“心”为何即“天理”，在层层哲学追问中，会使阳明心学体系显示出无法解决的矛盾，但是“心即理”的思想及由此而生发出的“良知”说和“致良知”的工夫论，却不可否认地体现着深厚的文化内蕴。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基石，它是对主体与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本体论的揭示。路平先生以自己开阔的学术眼界，既将王阳明建立在“心即理”基础上的心学体系，置于作为儒学新发展的宋明理学这一框架中加以阐述；又

将王阳明的作为其“心即理”学说展开的伦理哲学，置于与西方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的伦理哲学的比较中进行考察。正像路平先生所说，王阳明的心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都是关于人如何存在的哲学，所探究的都是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因此都属于展示明显的伦理意义的哲学。而存在主义最主要的思想来源是现象学，因此存在主义哲学中必定内蕴着现象学的某些因素。路平先生对王阳明和萨特的比较研究，引入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方法，将王阳明的心本体说置于意向理论的视阈中进行审视，揭示出王阳明所谓的“心即理”具有的意向性，表明的是“人心与天地一体”^①，这同萨特所谓的“存在”一样，建立的是人的精神与世界的联系，从而在本体论上将心物融通具有自在与自为的统一这一实质显现出来。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使得其心学体系必然引领人们以心性的修养和体验去直接感悟人生，进而在实现物我俱一、天人相合的过程中逐渐达到圆融自得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显露的正是阳明心学所推崇的生命意义，因而也就使阳明心学对于当代学者的文化思考具有独特的启示作用。

紧接着阳明心学，佛学也进入了路平先生的学术视野。贵州这块高原上，很早就有佛教传入，而以禅宗的影响最为深广。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后，从魏晋时开始就逐渐实现了中国化，隋唐时期大乘佛教八大宗尤其是禅宗的形成，更使佛教成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外来文化，也使佛学在中国成为继先秦道家学说之后，最能在形而上层面体现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的思想体系。大乘佛学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引导着的对生命的安顿，照路平先生看来，正是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所推崇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向往的生命的“诗意地安居”。当今世界，人们的灵魂正一天天地被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所异化，人们的心志正一天天地陷入物欲、权势的泥沼中而无法获得自由，因此人们越来越需要真正能安身立命的精神处所。只有这一精神处所，才能实现人的心性万物本体同一，进而实现人的生命对本体的超越，使物与我融而为一，使瞬间呈显永恒、成为永恒，使有限呈显无限、成为无限，这样，人的生命也就当然能摆脱物欲和权势的纠缠，从迷惘的、沉沦的以至无意义的状态，达到自在即自为、自为即自在的境界。因此，这一精神处所必然是诗意盎然的，是最美的。我想，正是如此，路平先生看到了大乘佛学在人的浮躁不安的情性需要有个空间得以沉静，漂泊不定的灵魂需要有个空间能够

^① 《语录》三，《王阳明全集》，第1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栖息的当代所显现出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在考察阳明心学、大乘佛学对心灵澄明的导引后，路平先生把目光投向了易学。易学所研究的《周易》，是中国古代一部从哲学上揭示宇宙和人类社会奥秘的经典文献，因此早就被称为“经”。对宇宙和人类社会奥秘的揭示，为的是对人生和人心的观照，对人的生命的关怀；这种观照和关怀，在《易经》中主要体现于对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关系的展示上。读《易经》，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易象乃是表征生命的符号，显示的是天地自然和人类的生生不息，而易象的所有内在矛盾则是生命之所以永远流转的根本原因，最终都受阴阳对立统一这个总规律的支配。阴阳由太极所化生，故而太极为生命之源，而太极所化生和内蕴的阴阳则为生命繁衍不息的动力，由阴阳所代表和制约的所有易象也就显现着生命的永恒变化。所以，南宋学者张栻说：“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极者，所以生生者也。”^① 这应该说深得《易经》生命哲学之精要。“易”之所以呈现万物生生变化之“妙”，最根本的是它呈现着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转化，阴阳的转化、祸福的转化、生死的转化，等等，交织成宇宙万物生机勃勃的图景，而生命也就在这种转化中展示出兴衰更替、新旧交变、“无往不复”^②、赓续不绝的运动模式。从路平先生对《易经》关于矛盾的思想所作的阐述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所呈现的生命的律动，而且还感受到为矛盾双方运动的规律所支配，人生的逆境与顺境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事业的成功与失败也会因一定的条件而相易，既然如此，我就想，文化特别是文化的内核无论怎样地消解，人的精神家园无论怎样地迷失，我们都应该坚信这一点：否极泰来。

路平先生对阳明心学、大乘佛学和《周易》思想的阐发，为的是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对贵州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这种探讨让我们看到，贵州文化因与传统哲学的密切联系固在历史上就形成了多元的格局，如果再加上从大娄山、武陵山、乌蒙山和苗岭中生长出来的少数民族文化，贵州文化就更是色彩斑斓、魅力无穷。但是我以为，在这本书中最重要的是，路平先生对贵州文化的论述，无论谈及黔中王门后学的学术成就，还是谈及阳明文化旅游圈的开发；无论评介各个高僧大德的事迹，还是评介梵净山佛教文化的特点；无论探讨以孙应鳌为代表的义理易学心学派的思想，还是探讨清代易学家启

① 张栻：《南轩全集》卷十一，清咸丰重刻本。

② 《周易·象传》。

蒙思潮的经世致用意义，都透露着对人的精神和生命的真切关怀。

每当我的心灵遨游于哲学的天地中时，我就能得到莫大的乐趣，读《传统哲学与贵州文化——黔学中的形上智慧资源》，我又一次有了这种感受。不用说，在写作这本书时，路平先生这位特别喜好哲学思索的著名学者，所得到的愉悦更是难以形容。我在获得思辨之美带来的享受的同时，又在想，倘若我来写这本书，会有怎样的思路？也许我会沿着易学——佛学——王学这样的顺序去展开对传统哲学的阐述，那么传统哲学与贵州文化的关系就得用另外的办法去处理了。但不管我与路平先生思路怎样不同，我们却一定会殊途同归的，就是说，最终都必然以对文化内核的形而上思考，表明对构建和守护人的精神家园的尽力倡导。

2013年6月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前言：本土形上智慧资源 ——“黔中三宝”

《周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意思是说关于宇宙人生的本质和规律是无形而根本的，这就叫做“道”，而万事万物是有形而具体的，这就叫做“器”。我们把依据形而上之道得出的思想称之为形上智慧，因为它作为精神性的价值信仰系统，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安身立命的一贯之道。那么，从形而上的“道”来观照贵州文化及其文化大师，贵州能带给人们什么东西呢？从历史来看，贵州虽僻处西南边陲之地，然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汉代即有舍人、盛览、尹珍，开创黔中学术气象。唐宋以降，兵燹屡兴，天荒人废，虽代不乏人，而载籍难考。至明永乐年间，始置贵州布政使司，由是人文彪蔚，与中原学术文化交流渐多。至明中叶后，黔地学人始称盛焉。建省600年来，在贵州的传统学术文化瑰宝中，最具有本土特点且又最能与全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接轨、交流和对话的当首推“黔中三宝”，即黔中王学、佛学和易学，这“三宝”是黔中传统文化中的奇葩，亦是黔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①它们相对于贵州原有的其他地域文化来说，博大精深，具有更加系统、更加理性和更加深刻的特点，再加上这一传统文化本身所蕴涵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使其自然拥有宏大的文化影响力和亲和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然能够给予人们以形上智慧的启迪，值得我们重新发掘和认识。

一、黔中王学：1500年所积累的形上智慧

黔中王学的产生缘自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明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在北京任兵部主事时，因上疏营救南京科道员戴铣等，被宦官刘瑾陷害，廷杖四十下狱，同年十二月谪为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三年（1508）三月到达贵州，五年（1510）初离开贵州，谪居贵州有三个年头。其间，他于龙场悟

^① 何谓黔学，详见本书《后记》。

道,使举世闻名的心学诞生于贵州。又创办龙冈书院,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首开黔中书院讲学之风,培育了大批黔中“夷汉”弟子。

王阳明在贵州讲学时,曾出现如嘉靖《贵州通志》所载“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的盛况。在数百听讲者中,其著名者有席书、刘秉鉴、蒋信、冀元亨、陈宗鲁、汤伯元、叶子苍、钱凤翔等人,他们是最早在贵州传播王学的学者。

王阳明离黔后,王门弟子在黔中南北分化,继续弘扬师说,大振阳明心学,讲学之风盛极一时,使阳明心学遍播全省,贵州人文蔚成大观。继王阳明于龙场创办龙冈书院后,其弟子和再传弟子中也有许多人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建书院、讲心学。王阳明谪黔成就了黔中人文的大事因缘,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心学弟子,再通过其亲传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四传弟子等的大力宏传、发展,至晚明时期遂形成贵州阳明文化圈。贵州阳明文化圈中的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是王阳明“龙场悟道”、“贵阳讲学”、“游历黔中”的真实见证,而且也是蕴涵着贵州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习俗等诸多方面的信息载体,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不可再生性的历史价值,因而它们将对当今的学人和游客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中国,王学的核心区域有五处,即浙江绍兴地区、贵州贵阳地区、江西吉安地区、江苏泰州地区和广东潮州地区。绍兴地区是王学的发祥地和阳明学说的成熟地,贵阳地区是王学的奠基地和过化地,吉安地区是王学的发展地和极盛地,泰州地区是王学的创新地和变异地,潮州地区则是王学的跨文化互动的融合处。

黔中王门,不仅可以独立门户,还可以作为王学向文化边缘地区传播的成功范例。在王阳明及其黔中王门弟子的影响下,终明之世,贵州各地建有书院20余所,书院讲学之风盛于中原,俊杰之士,比于中州。贵州是王学的诞生地,王阳明悟道的龙场(今贵州修文)又被历代学者视为“王学圣地”,故而无论是古之王门各派,还是今之新儒学,无不以“黔中王学”为其渊藪。大学者黄宗羲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著《明儒学案》时,按照人文地理将阳明后学分为浙中(浙江)、江右(江西)、南中(江苏)、楚中(湖南、湖北)、北方(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区)、粤闽(广东、福建)和泰州七大体系,却漏载了最早传播王学、开拓一方文明、颇具一定规模和造就了著名学者的黔中王门,致使“黔中王门”后学长期鲜为人知,被冷落、忽略达数百年之久。今天经过贵州学者多方奔走呼号,大力宣传论证,“黔中王门”之说

已被世人普遍接受。“黔中王门”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贵州是阳明心学形成的原点，在时间上，“黔中王门”最早学习和传播阳明心学。第二，“黔中王门”有众多著名学者，颇具一定规模，且影响一方。黔中王门的代表人物有贵阳的马廷锡，清平的孙应鳌、蒋见岳，都匀的陈尚象、余显凤、吴铤，思南的李渭、冉宗孔、胡学礼等人，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其中以孙应鳌、马廷锡、李渭三人为之最。其中孙应鳌崛起于西南，乃为一代名臣大儒，为黔中王门儒宗。他孜孜矻矻，以培育人才、兴起儒学为己任；当晚明心学风靡之际，传阳明心学于贵溪徐樾，与阳明后学诸子纵横交往驰骋，朝野内外莫不推服；又在黔中故里、黔东南清平（今凯里市炉山镇）建平旦草堂、学孔书院和山甫书院，集一生学问，阐明儒家文化和阳明心学，一时著书讲学，蔚成风尚，流风余韵，沾溉黔中数百年。第三，它具有贵州本土色彩，在思想上颇有共同的特点。一曰不执门户之见，颇具海纳百川之风。这点尤以孙应鳌最为突出，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二曰以求仁为宗，直揭知行本体。王阳明在贵阳始论“知行合一”说，使黔中王门弟子深受教诲和启发，从而将仁德作为知行本体，着力躬行实践。如李渭之学就是以求仁为宗，以毋意为功，力倡先行；而孙应鳌之学则主张即仁是心，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恰可与李渭相互印证。三曰以经证心，勇于创新。例如孙应鳌在解读“四书五经”时，往往是“以经证心，以心证悟”，不拘于传统的训律，不死抠书本，常常是随己发挥，从心学的角度去解释诸经的内容。这在当时有发挥人的主体意识，摆脱经书的束缚，启迪人们积极思维的进步作用。第四，它影响时间长，分布地域广。黔中王门主要有四代弟子，从明代中期一直持续到明末，影响长盛不衰。当时，它以贵阳、清平、都匀、思南等地为王学重镇，围绕所创办的书院开展心学的交流和传播活动。在贵阳有马廷锡执教的“阳明书院”，在清平有孙应鳌创办的“学孔书院”，在都匀有陈尚象、余显凤等人兴建的“南皋书院”，在思南有李渭讲学的“中和书院”，等等。由此创造了晚明阳明文化的历史辉煌。由此可见，贵州阳明文化圈是中原主流文化与贵州民族文化相交汇融合而产生的富有本土特色的文化现象，具有极高的文化品位，不仅本土色彩鲜明，民族特色浓郁，历史积淀深厚，而且独具魅力，价值非凡，意境深远，值得人们去关注、去研究、去开发。

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前，一直在苦苦思索成圣如何可能，以致格竹成病。他深切体察古之圣人的良苦用心，经历了炼狱般的煎熬而于龙场悟道，终于消解了生与死、心与物、有限与无限的内在紧张和二元冲突，实现了从求理

于物向心即理的哲学转变,实现了人生脱胎换骨的转变。其后他以无挂碍的生命实践和活泼泼的教化方式,先立其大,明其心体,又由体发用,即体即用,自觉履行成圣成贤的道德使命,担负起社会人生的责任与义务,展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博大胸怀。

龙场悟道,还使王阳明把孔孟儒学经过1500年所积累的形上智慧在明代中叶发扬光大,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世上磨练”、“万物一体”的理论,构筑了他博大精深的心学体系。500年来,王学不仅挺立了主体精神,展示了生命的自由,而且冲决了官方程朱理学的思想罗网,使当时的思想界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其哲学理念,为成千成万的仁人志士提供了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儒学在生命哲学、伦理哲学和宗教哲学三大领域中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儒学从中国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儒学日益成为21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对话语境中的显学之时,王学的人文精神日益具有坚强的生命力、持久的说服力和深刻的前瞻性。它对于我们开启主体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塑造我们的理想人格有积极意义;对于我们现代人挺立良知的主宰性,彰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对于当前我们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因此,开发具有原创性和根源性意义的黔中王学这个宝库,对于现代人来说无疑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黔中佛学:贵州学术文化的思想精华

黔中佛学是与黔中佛教相始终,主要以明末清初的贵州禅宗为代表。唐代牛腾在贵州大布佛教,是为佛教传入贵州之始。自此贵州乃有佛寺的兴建、佛像的铸造和僧人的活动。然其时,佛教的传布仅限于黔北和黔东两个地区,并以中原的大乘佛教为主流,以南诏佛教为支流。进至宋代,在黔北、黔东地区,佛教仍以强劲的势头向纵深发展,佛寺遍布其地;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贵州各地传布渗透,贵州土官土酋开始热衷奉佛兴寺,如黔东南的向氏、黔东北的田氏、黔北的杨氏、黔中普宁州的孟氏,皆笃信佛教,大建梵刹,由是佛教影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贵州腹地亦始建佛寺,住有僧人。至元代,佛教随中原文化深入贵州腹地。其时,印度指空禅师在黔西弘法,江西人彭如玉于黔中传教,二者异曲同工,注重神通灵异,皆与黔地原始巫风相契,遂使佛教深入黔西苗彝聚居之区和崇山峻岭的黔中腹地,从而大大拓展了佛

教在贵州传播的领域。

明代贵州建省后，贵州佛教开始进入繁荣发展时期。首先，密切了与中原佛教的关系。在明王朝倡教政策的支持下，贵州土司流官崇佛兴寺，僧官始持教度僧，黔中僧徒士民大建寺庙，高僧大德亦联袂而起，遂使佛教迅速在贵州传播。其次，通过“调北填南”，特别是通过军屯、民屯、商屯，大批汉人移入贵州。这样，一方面将汉族固有的佛教信仰带入贵州，另一方面又为僧人深入黔境游方行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再次，明代贵州大修驿道，遍立卫所，形成了一条以府治卫所为通道的佛教传播路线，横贯东西，纵穿南北，使佛寺遍及各府卫。

明末清初，天崩地解，贵州涌现了以丈雪、敏树、燕居、圣符、山晖、莲月、语嵩、赤松、瞿脉、厂石、善权、善一、梅溪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灿若群星的佛学大师，他们的语录著作，不仅代表了当时西南佛教思想界的最高水平，而且也反映了贵州地区禅宗鼎盛的实况，仅《嘉兴续藏》就收入黔僧语录达数十种之多。他们的人品学问、弘法业绩和佛学造诣，不仅彪炳黔省，冠映西南，即使与中原诸佛学大师相比，亦不逊色。其影响所及，不限于佛教僧徒内部，且与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亦息息相关，其佛教哲学内涵十分丰富，心理分析相当细致，辩证法思想也非常深刻，从而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这些佛学大师不仅给贵州的哲学、思想文化以很大影响，而且还对安定贵州社会，教化黔中人民，培养乡邦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贵州佛学大师的禅学著作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不仅撰写中国禅宗史时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编纂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时也不能忽视其存在与贡献。从贵州的这些佛学大师的思想中，可以看到禅学是贵州乃至中国学术文化的思想精华，是东方形上智慧的代表。遗憾的是，由于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境内山峦重叠，自古以来为“西南之奥区”，黔中佛学也因之湮没在人们的偏见和漠视之中。即使在今天，这些黔中佛学大师的思想，亦鲜为人知，这不能不令人悲哀。

逃禅出家，乃明末清初士大夫之风气，滇黔为南明最后领地，明士大夫多集于此，故黔地士大夫多有逃禅出家者，由此形成黔中特有的禅宗佛教文化景观。他们或倾心佛门，喜嗜禅悦，如蒋杰、谢士章、丘禾实、艾友兰、文安之、曹申吉、查慎行、曹维成等士；或啸歌山林，逃禅遁隐，如李合麟、刘个臣、吴中蕃、刘文季、胡钦华、邹宗孟、吕大器、高雪君、李专等士；

或索性削发出家,以示爱国之情操、不仕之决心,如钱邦芑、郑於斯、陈起相、郑逢元、黎怀智、朱文、程源、皮熊等士。他们的大量表明心志的诗文著述,如钱邦芑(大错)的《大错和尚遗集》、陈起相(掌山)的《掌山法语》等,不仅具有极其深邃的禅学思想,而且也体现了他们感鬼神而泣风雨的浩然正气。故其禅学思想与人格精神,不独提升了贵州佛教的文化品格,有功于黔中佛学,而且亦有助于后人激发爱国之热情。

三、黔中易学:本土化经学的言说方式

黔中易学多集中于明清时期。明清时期是贵州文化史上空前繁荣的一个时期,全省各地涌现了一大批研究《周易》的学者。据贵州地方史志记载,明清两代黔中易学著作达43部之多。明代正统、景泰年间易贵的《易经直指》,首开明代黔人研易之风,其后李渭的《易问》、阴旭的《读易应蒙》、孙应鳌的《淮海易谈》问世,迎来明代黔中易学的勃兴。入清代,安平(今平坝)陈法的《易笺》,麻哈(今麻江)艾茂的《易经人道集义》,铜仁戴世翰的《易艺》,黎平胡秦川的《学易确然录》,贵阳王璋的《易经集说》、傅昶的《古易殊文记》、《易源》、孙濂的《易理三种》、丁泽安的《自得斋易学》、《学易节解》、《易学三编》、《易学附图》、《易学汇说》,清镇文天骏的《周易或问》,遵义肖光远的《周易属辞》、《易字便蒙》、《周易属辞通例》、《周易属辞通说》等易学大师的著作,构成黔中研易的狂飙运动,标志着黔中易学系统的形成,从而有了与中原易学学术思想对话的基础。黔中易学,作为一种本土化经学的话语言说方式,表现出与中原易学界主流思想不尽相同的风格。其中,最著名和最有哲学意蕴的当数孙应鳌的《淮海易谈》。《淮海易谈》共4卷,近十万言,是孙应鳌系统地专门研究、阐发《周易》的哲学专著,集中代表了其易学观,是贵州建省以来最有影响的易学著作。

孙应鳌易学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其属于义理易学中的心学派。义理易学是易学研究中的主要流派之一,主要阐明《周易》的哲学大义,与象数派、训诂考据派相对。义理派既反对象数派的繁琐,又否定训诂考据派的训诂,而精于明理,注重探求宇宙和人生的哲理,其代表人物有魏晋时的王弼,北宋的胡瑗、周敦颐、二程,南宋的朱熹。孙应鳌易学对卦爻辞的解说亦主张取义,属于程朱的易学系统,是义理派易学。然而,孙应鳌易学主要以人心,即人们的精神和道德意识来解释易理(宇宙的原理),属于义理

易学中的心学派，这与程朱理学派强调天理为事物之所以然的易学哲学又有所不同。这样，孙应鳌一方面继承了魏晋唐宋易学中的义理学派的传统，一方面又扬弃了程朱的理学观点，以心学的明心体观念为中心，解释《周易》经传。孙应鳌易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其解《易》往往是“以经证心，以心证悟”，不拘于传统的训律，不死抠书本，常常是随己发挥，从心学的角度去解释《周易》的内容，强调“《易》之不可为典要”，在“用《易》者，心用之也”^①。孙应鳌易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其治易学的方法是沿着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论证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孙应鳌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易学方法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心便是天，天非外在：“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外无道，其实体备于人，人外无道。……天人无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是天人合一本诸身而征诸庶民者，一以贯之矣。”^②显然，这是王阳明天人一本说的发挥。另一方面，是把“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先在的本体和最高的精神境界。在孙应鳌看来，就心的本来面目而言，每个人与圣人一样，都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因为在本体论上，人与万物本来就处于元气流通的一体联系之中：“天地之所以为天地，浑然唯此元气也。……元气之成象为日月，元气之运行为四时，元气之变化为鬼神，元气之虚灵之在人者为心，一也。”^③这种元气流通、心气合一不仅具有物质实体的意义，同时也包含着把宇宙看成是一个有机系统的意义。无论哪一方面，都是强调万物与人心的息息相关的不可分割性。以天地物为一体既是本体，又是境界。孙应鳌认为，万物一体的境界就是把万物看成息息相通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大我之境，把宇宙每一部分都看作与自己有直接联系，甚至就是自己的一部分，这样的境界就是仁。他说：“仁言体，盖天地万物之备于我者，无少缺欠，无少渗漏，其浑然无所不包，我之此身真与天地万物合体矣。”^④孙应鳌易学的第四个特点是，直接肯定宇宙本体与伦理道德原则的同一性，属于伦理型的易学哲学，带有中国哲学的固有色彩。晚清贵州遵义的著名学者黎庶昌在《刻〈督学文集〉序》中说孙应鳌之学“以求仁为宗，诚意慎独为要，以尽人合天为求仁之始终，其于成己成物、位育参赞、天人一体之原，心契微妙，温

① 孙应鳌《淮海易谈》卷一，《孙应鳌文集》第17页，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二，《孙应鳌文集》第128页。

③ 孙应鳌《淮海易谈》卷一，《孙应鳌文集》第13-14页。

④ 孙应鳌《淮海易谈》卷一，《孙应鳌文集》第12页。

故知新，浩然自得”。从孙应鳌易学的这种特点来看，这一评论无疑是中肯而全面的。

由此可见，孙应鳌不仅是晚明心学派易学的代表，同时也是贵州明清时期义理易学心学派的先驱，其心学解易模式对贵州清代易学家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一定影响，开启了贵州易学经世致用的早期启蒙思想。

由上述可见，“黔中三宝”源远流长，积健为雄，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普遍尊重和认同，代表了贵州传统文化的人文智慧，为贵州的民族文化和学术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曾经的辉煌正在渐行渐远，今之贵州似乎除了多彩贵州就乏善可陈，一种文化开不出美丽的花朵，是因为它远离了形而上的智慧。在建省 600 年的今天，如何发展和繁荣贵州文化、打造贵州文化和宣传贵州文化，我们往往迷失了方向，未能很好地找到本土传统文化中真能滋生现代化意识的活水源头，未能科学地分析贵州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影响并考察其创造转化的可能和途径，未能发现本土传统的形上智慧与现代社会的人生意义和存在价值的结合点和嫁接点，从而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文化知识体系这个软实力。这就不仅掩埋了“黔中三宝”的思想光芒，使之被人遗忘，濒于夭折；而且无法解释自己的本土文化，无法建立我们的文化自觉乃至文化自信，从而严重地延缓了贵州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进程。作为当代贵州人，我们总是生活和思考在贵州的传统文化之中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已经死去的历史陈迹，而是至今仍活着的文化生命。今天我们要打造从多彩贵州到文化贵州再到思想贵州，“黔中三宝”作为贵州本土的形上智慧资源，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进一步开发“黔中三宝”，这对于贵州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加强地域文化的建设，对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贵州在我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进程中的贡献，和重新评估整个贵州学术文化在全国的地位，对于最大化地利用区域文化资源以作现代性的创造转化，使贵州人在了解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回应时代的挑战，对于振奋贵州人文精神，弘扬传统文化，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

因此，本书亦相应分成上中下三篇，即上篇是王学与贵州文化，中篇是佛学与贵州文化，下篇是易学与贵州文化，由之对相关的内容进行探讨和论述，以此纪念贵州建省 600 周年。

目 录

上篇 王学与贵州文化

第一章 王阳明心学思想	(3)
一、王阳明求道悟道弘道的为圣之路	(3)
二、王阳明与萨特的伦理哲学之比较	(13)
三、王阳明的教育方法	(32)
第二章 王阳明“龙场悟道”揭秘	(43)
一、前悟道之苦难时	(43)
二、悟道之体悟时	(46)
三、悟后起修之受用时	(57)
四、王阳明“龙场悟道”的人生启示	(61)
第三章 王阳明在贵阳的“知行合一”说	(69)
一、“知行合一”说的思想渊源	(69)
二、“知行合一”说的理论基础	(71)
三、“知行合一”说的实质	(74)
四、“知行合一”说的内容	(77)
五、“知行合一”说的影响和意义	(80)
第四章 王阳明与贵州文化	(86)
一、王阳明与贵州明代书院	(86)
二、王阳明与水西少数民族	(95)
三、贵阳扶风山阳明祠考	(114)
四、黔中王门：贵州文化阳明文化学派的形成	(120)
五、贵州阳明文化旅游圈的开发	(133)